

第三章 近百年来的宜兴陶瓷

第一节 外国资本主义入侵初期对宜兴

陶瓷业的影响

一、鸦片战争后宜兴陶瓷业的逐渐变化

明末清初，由于我国商品经济的发展，在某些手工业中已经产生了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那时，在宜兴陶瓷业中带有资本主义萌芽性质的手工工场也已逐渐形成。一八四〇年爆发的鸦片战争，进一步破坏了中国封建社会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促进了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客观上为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条件。

鸦片战争后，宜兴陶瓷业中的资本主义因素仍然相当薄弱，而且保留着浓厚的封建色彩。当时陶瓷业手工作坊的场主叫窑户。大窑户们既拥有窑产，也拥有土地。有的大窑户就是拥有几百亩或上千亩土地的大地主。农忙时他们雇工从事农业生产，农闲时则使雇工从事窑业活动。大部份陶瓷业工人也是农忙时受雇地主，农闲时又受雇于窑户。他们都与农业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因此，尽管在陶瓷业中资本主义萌芽较早，但是，它的发展却很缓慢。

鸦片战争以后，特别是太平天国时期镇压了此地的一批地主豪绅，严厉地打击封建势力以后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这里陶瓷业生产中，

逐渐产生了一批新客户，这些新客户经营的手工工场代替了古老的手工作坊。宜兴陶瓷业手工工场有两个共同特点：一、手工工场都是独资经营，或者是属于一个家族经营，几乎没有合伙的组织。二、部份手工工场主仍占有土地，多者上千亩，少者上百亩。地租成了这种手工工场的资金。

手工工场主，一般雇用工人四、五十人，最多百人。这些工人在工场主的压迫剥削下，拿着微薄的工资，出着牛马力，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大客户只管理重大事情，日常事务由聘请的一个或两个帐房先生（实际上是大客户的代理人），既管经营，又管生产。手工工场的劳动安排由“大长头”负责，大长头是由大客户挑选有相当陶瓷生产技能的工人担当。客户是手工工场所有者，他们以极其残酷的手段剥削广大陶工，从而掠夺剩余价值，以扩展他们的资本。他们的资本一般都在五千元以上，最大的有十万元左右。他们每年平均都能烧三、四十窑次。蜀山、潜洛、上袁等地具有传统性的紫砂生产也有了一定的发展。当时已有十条窑专烧紫砂，每条窑一个月可烧出一窑紫砂货，每窑产品都在万件以上。这样计算，全年紫砂产量达一百余万件，超~~过~~^{达到}历史水平。

十九世纪末叶，由于陶瓷业的迅速发展，又促进了牙行的创设。到了一九一一年，丁蜀镇汤渡一带的牙行发展到十余户，一九二七年达到十八户。

宜兴陶瓷业的牙行分为两种，一种叫“印只行”，也叫“正货行”。

行主有两种性质：一种是由当地大窑户为烧窑开行相结合所开办的；一种是由外埠陶瓷商店派人来经营的。这种牙行专门经营正品陶器，范围大，资金足。通常一个牙行有十至十五个从业人员，烧窑与开行相结合的行家不再另开设，包括在他们的企业内。纯粹行家一般设经理一人，帐房一人，理货员（鉴定陶瓷品质的专业人员）五至七人，并有练习生三至四人。经理负责掌管整个行家的经营管理，听从资本家意旨，对内负责陶瓷品种的购进，对外联系业务，或代客买卖，提取中间形式剥削的“行佣”。大都是淡季收购囤积，旺季向外推销。陶瓷淡旺季的价格相差很大，从而获取高额利润。另一种牙行叫“次货行”，也叫“号货行”、“炉头行”。这种行家不设门面，很少资金，专门代客买卖。这种行大多数是一个人独开，也有二、三人合开，不分什么老板伙计，分拆“行佣”。次货行负责经营中小窑户，手工业者的次品陶瓷，对卖主采取“加码”（一只次品缸是三折，却照四折计算价格），对买主采取“吃盘只”（买主预支的货款，一元只有九角到手）。由于他们买空卖空，投机倒把，尔虞我诈，手段恶劣。当时人们形象地把号货牙行的经纪人称作“白天吃太阳，晚上吃月亮”。深刻地揭露了这些人剥削、吸吮劳动人民血汗的可憎面目。不论正货行、次货行，不论靠季节差价还是依靠非法“佣金”，牙行获利很大。发展很快。它们的设立，加速了小窑户、手工业者的破产，使最低层的广大陶瓷工人，惨遭盘剥。

这时陶瓷业生产的分布和生产产品分工也渐逐形成。解放之前，

宜兴陶瓷业已有了初步的分工，但只限于粗细货、日用陶瓷与紫砂工艺品。太平天国革命以后，日用陶瓷的分工及划分地区范围逐渐形成。到了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宜兴陶瓷业组织分工已臻完成。这个时期的陶瓷业生产主要分布在三个地区：丁山和汤渡主要生产日用陶瓷；在宜兴城内，一些专业性商店从事生产和经营紫砂工艺品（直至抗日战争爆发才告终）；在蜀山、潜洛、上袁，专产粗细紫砂器。同时，粗、溪、黑、黄、砂、紫砂六个行业地区分布已经划分。粗货业大都集中在丁山、白岩、边庄、蠡墅、湖渎和潘家村等地。其主要产品是大缸、龙缸、酒坛、盆盂、火钵、砂锅、琉璃瓦、龙头、屋脊等。溪货业集中在汤渡生产。主要产品是坛（俗称“甕头”）。黑货业分布在边庄、高家桥一带，主要产品是大小盆类、油壶、粗钵及溺壶等。黄货业集中在蠡墅后浜一带，主要生产各种煨罐、水罐、药罐等。砂货业分布在蜀山、前墅、虞墅一带，产品与黑货业相同，但釉色有别（泥料配方不同，烧成后，砂货釉色呈鲜明的红色，黑货釉呈黑红色即赤褐色）。紫砂业分布在蜀山、潜洛、上袁一带，主要产品是茶壶、茶具、花盆、瓶、鼎、果物玩具、假山石景等精细工艺品与普通茶具。此外，白、录货（即煨罐、砂锅、龙坛、花钵、窑碗、泡菜坛等），均为粗货、溪货的附产品。主要分布在丁山、白岩、边庄、蠡墅、汤渡一带。

这一时期，宜兴陶瓷生产，也逐步发展成一个多工序的行业。陶瓷业分工也逐渐形成。其中有专门负责搬坯、驳货、烧窑的；有开采泥料、加工泥料的；有制釉的；就是工人最多的成型工，不仅按粗、溪、黑、

黄、砂、紫砂分工，即使粗货，也分大缸、片子、尺八、洋装等等，行有行规，不得跨行，不得跨越。以上分工的形成，体现陶瓷业生产的规模随着生产的发展而越来越大。

随着陶瓷业生产的不断发展，销路畅通，销区扩大，陶瓷业资本家为了获得更多利润，工业资本又扩展到商业资本，纷纷在江、浙和安徽省开设商店，甚至在国外开设陶瓷商店。仅一八五〇年至一九一一年，除鲍鼎泰外，丁蜀镇窑户在江南及杭嘉湖地区新开设的陶瓷商店就有十一家。从下表便可看出。

1850—1911年间宜兴丁蜀镇窑户在外地开设的陶瓷商店

地 点	店 号	店 主	开 设 时 间
上 海	鲍生泰	鲍 家	一八五〇年
上 海	葛德和	葛德和	一八六〇年
江苏常熟浒浦	诚 泰	鲍 家	一八七〇年
常 州	永大昌	" "	一九一〇年
无 锡	信 泰	" "	一九一〇年
无 锡	鲍金泰	" "	一九一〇年
上 海	福 康	陈子环	一八八〇年
江苏常熟浒浦	陈义隆	陈子环	一八八〇年
江 苏 江 阴	元隆盛	陈子环	一八八〇年
杭 州	张万清	张自清	一九〇三年
浙 江 常 浦	同 泰	鲍 家	一八七五年

在二十世纪初，南洋地方橡胶工业开始发达起来，需要大量中国的陶瓷器装贮生橡胶。当时，丁山镇鲍、陈两姓合伙在新加坡开设“鼎生福”陶瓷店，直接销售洋坛、大龙缸、大腰园等产品。一九一二年，丁山白岩葛翼云将他家特制的火钵、花瓶及买进的紫砂花盆源源运往日本，和日本商人合伙在大阪开设陶器店，从事陶瓷产品经营。由于帝国主义当时还无法同我国的传统陶瓷产品相竞争，所以在帝国主义入侵以后的几十年内，它仍然^能在生产上不断发展。销路也不断扩大，以至扩展到国外的一些市场。

二、西方资本主义入侵后，对宜兴陶瓷产品的影响

鸦片战争以后，西方资本主义打破了清政府的闭关自守的政策。门户开放以后的中国，成为它们商品倾销的市场。甲午战争之后，又成为它们投资的场所。它们在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对中国侵略，使中国民族工业受到了致命的打击。许多手工业遭到破产。宜兴陶瓷业也不例外。只是由于它原料上能够自给，原料和劳力价格低廉，产品的价廉物美，以及历史上形成的广大人民群众对它的喜爱乐用，在国内市场上有深厚的群众基础。加之，西方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分子的需要。因此，它在帝国主义入侵以后的一段时间内，仍然可以挣扎图存。但是，当帝国主义的机制洋瓷在国内外市场上倾销之时，终于把宜兴陶瓷工业推上了危机的道路，因而日趋衰落。

宜兴陶瓷业在和外国资本主义的斗争中，为了求得生存，它不得不

适应市场上的需要，因而在产品仿制古陶日益风行。这充分表现了帝国主义侵略的影响。自从门户开放以后，西方古董商贩大批收罗中国文物。他们强取豪夺，偷窃盗掘，无所不用其极。宜兴各窑产品，如紫砂器、宜兴均等，都成了它们收罗的对象。由于古代产品留下来的太少，“区区藏器不足以供无尽之取求”（见寂园《壶雅中卷》，于是仿造古代器皿日渐发展起来。这是其一。其次，为了迎合外国商人的需求，产品不再用心研究其传统艺术，而只求其表象华丽，款式新颖，不顾器之实用，只追求新奇。第三，由于宜兴陶瓷品价廉物美，形制实用，不仅为国内人民喜爱，也为外国人乐用。在海运开放以后，它的部分产品外销量也日益增多，如紫砂陶器、均釉器销往日本、墨西哥、南美等国，腰元、洋坛、龙缸等销往印尼、泰国、越南。第四，自甲午战争之后，帝国主义国家在我国兴办了一些新工业，需要一些陶瓷器件，因此到了二十世纪初，陶瓷制器逐渐扩大到建筑、卫生、化工、电器等一些方面。发生了一些变化，但是由于宜兴陶瓷长期以来形成了自己的特点，深受国内外人们的喜爱，因此，在外国资本主义入侵的初期，它仍能继续发展。

第二节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宜兴陶瓷

一、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宜兴陶瓷工业的发展

正当中国的陶瓷业在外国帝国主义掠夺下，日益走向危机的时候，列强之间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由于欧美帝国主义国家忙于战争

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压迫，中国的民族工业……又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毛泽东选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第二卷第590页）。宜兴陶瓷业在这种情况下也得到了相当的发展，当时国内外市场不断扩大……许多大、中城市的陶瓷商人前来采购订货；有些产品大量外销，整个窑场生产多，销路广，十分繁荣。这种繁荣的情况，以一九二四年前后的几年为顶点。

据一九一九年《江苏省实业考察报告》记载：宜兴陶器，名驰中外，县城东南的蜀山、丁山、汤渡、川埠一带沿山居民，家家制坯，户户捶泥，面积散处数乡，窑座共四十余座。蜀山、川埠，专制紫砂茗壶、饮食器皿、花盆花瓶等；蠡墅黑货业专制龙盆罐头；黄货业专制水罐、熨斗等；丁山、白宕专制缸类；汤渡专制^坛。男工约三千，女工约二千五百；泥场临时工因季节增减。整个这里一带居民，全家劳动，有的碎土，有的练泥，或徒手制坯，或户外晒坯，或研制釉料，或绘画^上，或^上雕刻，或装坯烧窑。不论男女，不论老少，各司其事”。“所制之器，种类繁多，不及备记，大都为饮食器、装饰器、杂器三种，常年产值在六十万元以上。”（引自《江苏省实业考察报告书》）。就连宜兴丁山、蜀山一带的农民也“大都以制造陶器为副业，家家户户，经营陶业，每年很少休闲，有时要干活至深夜。”

在这一时期里，资金在五千元以上的新窑户就有十四户。随着生产的发展，手工工场的建立，比古老的手工作坊前进了一步，采用了新工艺、新技术。1925年，华盖公司使用简单的机器生产釉面砖。1930

年，资本家合资一万元，在汤渡开办“三益琉璃厂”，生产盖瓦、筒瓦、花^管屋脊、滴水、花窗、竹节栏杆、龙头正吻等。有部分资本家见到有利可图，合伙投资几万元，兴办“开山公司”，也使用机器生产，并钻研泥、釉配方，改进烧成操作，提高产品质量，千方百计扩大琉璃销路，与三益琉璃厂竞争。三益琉璃厂开始年产琉璃瓦一百余万件，年产值十七余万元；开山公司年产二百余万件，年产值卅余万元，比三益厂增加了一倍。

辛亥革命以后，特别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宜兴陶瓷业销售出现七八十年来未有的盛况，资本家在外埠^新开设的新陶瓷商店就有几十家。上海有“鲍源信”、“道大新”、“铁画轩”、“吴德盛”、“章新泰”、“利用”、“兴盛棧”等；杭州有“源隆顺”、“兴昌”；天津有“豫丰”；烟台有“同品祥”；青岛有“和盛”；武汉有“ ”；无锡有“蒋义茂”、“蒋仁茂”；常州有“永泰”；南通有“瑞泰”、“盛泰”；镇江有“鲍信盛”等等，这些外埠的陶瓷商品销区扩大，遍及东北、河北、山东、安徽、浙江、福建、江西、湖南、湖北各省。

那时候，宜兴陶瓷的国内市场显著发展，出口外销也急剧增长。单上海“葛德和”陶器店，运往日本的火钵、花瓶、花盆、紫砂花盆等，出口年销量由六万元发展到十五万余元。运往菲列宾的龙盆罐头“五园套”，年销十万套，达三万元左右。上海其他陶瓷商店，又与葛德和争做南洋生意，运往东南亚、新嘉坡的洋坛、龙缸、腰园等产品每年至少八万件，远销墨西哥、中南美洲如智利、秘鲁的紫砂工艺品也逐年增多。

称西洋生意。封建军阀和官僚资本家看到宜兴陶瓷业的发展，认为有利可图，也先后挤进宜兴陶瓷业。1918年由军阀政权出面投资十余万元在蜀山镇开设了“江苏宜兴陶业工厂”，由于他们争利夺利，不善于经营，很快就破产停止。之后，官僚买办资本也开始染指宜兴陶瓷生产。上海的“时评洋行”就是其中之一。最近在潜洛、上袁一带发掘窑址时，发现抗日战争以前大量的上海“时评洋行”烧制的紫砂残片。宜兴陶瓷商品出口的盛况，可以从下表得知大概。表中所列数字，虽为全国出口陶瓷的总数，但是我们不难想象，宜兴陶瓷当为全国出口陶瓷品的大宗。

1912—1924年全国陶瓦器出口量价值表

年 代	出口海关两	年 代	出口海关两
1912	908639	1919	752757
1913	986002	1920	700507
1914	862445	1921	666311
1915	830152	1922	648045
1916	1092081	1923	951666
1917	942351	1924	1202892
1918	678790		

(引自《历年海关报告》)

这段时间，宜兴陶瓷业的发展，在旧中国已达到全盛阶段，被称为宜兴的黄金时代。据《国际劳工通讯》报导“其营^业估值约为每年四百数_人”

十万元。

宜兴陶瓷业代代相传，技艺精湛的新产品相继问世。这一时期，由于国内外对宜兴陶瓷业的需要量日益增多，促进了宜兴陶瓷业的不断发展。在生产工艺技术上也不断突破旧法，逐步采用新的生产工艺技术。在原料粉碎、成型、模具、装窑和烧成等工序，都有了一些改进。

原料粉碎，以前一直是用人工捶泥，生产效率低，劳动强度大。三十年代后，随着手工工场的扩大，泥料需要量的增加，普遍地采用畜力碾泥（牛拉液场碾碎泥料）。

大缸坯件成型，原采用“卡把”成型，所谓泥条盘筑法，这一古老的旧法，逐渐为“片子”新法替代。“片子”新法，所谓“四软操作法”即软打、软接、软拍、软修。软打就是将泥料放在工作泥橙上反复捶练三遍，用规车制成泥片、泥条；软接就是趁软和镶接，逐段加高（卡把是六段镶接，片子是五段镶接）；软拍是用工具内外相衬，拍打结实；软修是趁干燥到含水量9—11%时，有一定的坯体强度，作一次最后的整形。片子与卡把相比，有着成坯周期短，结构紧实，重量轻，光洁度好，底平刮光容易，如果要加“贴花”（堆花）工序的，贴的画面不易剥落，入窑烧成质量好，为“苏缸”的形美质坚创造条件。

三十年代以前，模具大多是木材、陶质制成，吸水率低，脱模困难，坯面粗糙，容易粘坯。到三十年代开始采用各种石膏模，不仅把木模、陶质模的缺点弥补，规格尺寸较易统一。

溪货产品装烧窑时，原未大量采用“空窑”旧法，汤渡精美产品，

传统装窑法是相对叠装，叠叠加高成柱，间以砂石片间隔，防止粘接。一些较大型的坛类坯件里面空着不利用。三十年代以后，制坯工人、手工业者家属到姦壁台山黄货产地去学习水罐、熨斗等小坯件制作，增加产量。每窑产值由此增加200—300元。

还有一个较大的改革，这一时期前，逐渐把“龙窑”加高放长，从20—30公尺增至40—60公尺，并改进烧成操作。

一般龙窑分上中下三段，大约各占全长的三分之一。约在1930年以后，三益琉璃瓦厂、开山公司首先实行“对号划段”烧窑新法。对号划段就是根据窑的上中下三段，分配不同的燃料。这样烧法的好处是，可以合理利用燃料，较科学地掌握升温，比单凭眼光看火度可靠，从而保证产品的质量，特别使琉璃瓦的釉彩鲜明光亮。

在此期间，还先后出现采用“机压冲床成型”泥龙头；泥料少数用搅拌机生产；日用粗陶缸器装窑用的窑具，由清代的锯齿形片改为“钉子”片，有利于装窑，保证热气流通畅，提高产品质量。还应用化工原料配釉，如均红、天兰、深兰、铭录、金星录、金黄等绚丽多彩的釉色。泥料配比也有改进，开始生产化工陶瓷、卫生陶瓷，首创乳白釉，填补宜兴陶瓷生产一个又一个空白。

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宜兴陶瓷业的再次衰落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宜兴陶瓷业从危机中开始重新发展起来。就在这期间，重重危机的阴影又开始笼罩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欧

美帝国主义列强忙于战争，所以“在一个时期内给了日本帝国主义以独霸中国的机会”。（毛主席：《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日本利用这一机会，不断扩大对中国的经济侵略。1920年，日本洋瓷输入金额达到六十七万一千一百三十一海关两，居整个洋瓷输入的首位。那时，宜兴陶瓷业的均釉火钵、紫砂花盆等大量销往日本。日本在集中全力对中国进行政治压迫经济侵略之时，对此当然不会甘心。日本对宜兴陶瓷业采取双管齐下的压迫排挤政策。首先在其本国的关税上加以限制。中国火钵等陶瓷器在日本进口，关税率从原来的5—7.5%，提高到15%、30%，直至50%。日本洋瓷向中国输入只能抽1.2%的进口税。由于日本人民喜爱宜兴火钵、紫砂花盆，虽税^力骤增而并没有因此减少销量。日本政府更进一步加强对中国商品的限制措施，在1930年左右进口税再度增加，宜兴陶瓷竟按100%征收海关税，使宜兴火钵的输出受到沉重打击。到一九三三年左右，中国陶瓷在日本的销路，几乎断绝。另一方面，日本在常山等地仿制中国紫砂陶器，并在有的地方仿制宜兴火钵。在其本国排除宜兴陶瓷，甚至大量输入中国，争夺中国市场。由于日本仿制的火钵在制造技术和质量上，尤其在釉彩的色泽方面始终不及中国火钵。紫砂陶器的仿制品，在泥质、色泽、艺术、形制各方面都较逊色，没有销路。日本商人黔驴技穷，最后停止输出。

战后，宜兴陶器的出口也遭到美帝国主义的刁难。宜兴向菲列宾出口的龙盆罐头，一向是用草绳包扎的。1930年，美帝为了阻挠中菲

贸易，借口中国的草绳有细菌，禁止进口。当时菲列宾是美帝的殖民地，一切要听从美帝支配，即使后来改用菲列宾麻绳包扎，但其仍居心险恶，从中阻挠，何况包装用的菲列宾麻绳价格相等于一套“五园套”的代价。美帝对宜兴陶瓷业的摧残，以致不得不中断了中菲在这方面的贸易。

在国内，第一次世界大战一结束，帝国主义列强又卷土重来。在他们的支持之下，中国的封建军阀又开始混乱起来。一九二四年以后，盘据在江苏、浙江一带的齐燮元和卢永祥、杨雨庭和孙传芳等之间的战争，连续发生，使广大地区的人民生命财产遭受了深重的灾难，造成社会紊乱，城乡萧条，交通阻塞。宜兴陶瓷业生产因此受到很大影响，国内外销路急剧的衰退。

一九二七年以国民党反动派为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叛变革命，出卖民族利益于帝国主义，这就招致帝国主义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对中国的侵略，致使洋瓷大量进口。一九二〇年洋瓷进口量为95万余海关两，到一九三〇年则增至265万海关两，十年之内，增加了近二倍。相对之下，中国陶瓷的出口量则大为降低。一九二〇年——一九三〇年，中国陶瓷出口量562万余海关两降为不到265万海关两，十年之内，减少了一半以上（参看1920至1930年《中国海关贸易报告》）。

在帝国主义日益加紧对中国的侵略和压迫的形势下，国民党反动派对内则加紧其反革命的内战政策，竭尽国力对革命进行围剿；对外则帝国主义侵略则屈膝投降，一让再让，致使日本帝国主义终于在1931年9月18日发动了武装侵略，迅速占领了我国东北全境。国民党反动

派的反动卖国政策，不但纵容了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侵略，而且带来了天灾人祸，致使国土丧失，民生凋敝，把国家民族日渐拖向绝境。在情况下的宜兴陶瓷业自一九三〇年以后，渐形衰落。一九三一年长江水灾及一九三二年沪上中日战争，更使陶业一落千丈，无法挽救。（参见李藏荫《宜兴陶瓷工业之检讨》《国际贸易导报》1935年第七卷第三号）。尽管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抗日爱国运动日益高涨，抵制日货运动在全国迅速开展，缩小了日货的销路，使宜兴陶瓷业在一九三二年出现了新的转机。可是，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坚持其反动政策，这种转机终究难长。一九三四年蒋介石发动的反革命内战日广一日，加之是年全国大旱，使宜兴陶瓷业在双重灾难下，又陷入了深重的危机。虽然在1935年和1936年，由于国内农业丰收，陶瓷业生产又出现了回升。但是，在那种民族危机、社会危机的艰难关头，这种陶瓷业销路忽好忽坏，倏盛倏衰命运总难改变。在日本帝国主义于一九三七年全面扩大侵华战争的时候，致使宜兴陶瓷业生产降低到二十年来的最低水平。

1924—1937年全国陶器出口价值表

年 代	出口海关两	年 代	出口海关两
1924	1202892	1931	765754
1925	769584	1932	390279
1926	850193	1933	385587
1927	882828	1934	370528
1928	848424	1935	459769
1929	679085	1936	515929
1930	778961	1937	354258

(引自《历年海关报告》)

从上表可以看出，1937年的全国陶器出口价值是354258海关两，与历史上最高水平的1924年比较，下降了近三倍，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1913年（986022海关两）比较下降了近两倍。

这个时期，宜兴陶瓷业日渐衰落，除上述原因外，在窑户经营本身上也存在着问题。在国内反动势力的压迫下，挣扎苟延的窑户们为了生存与发展，拼命地向陶瓷工人们进行榨取，使广大陶瓷工人生活无着，朝不虑夕，他们基本上失去了对生产的兴趣。窑户们也经常处在破产的边缘。为了囤存，争利于市，互相倾轧，大鱼吃小鱼，他们既无能力，也没有心思去提高技术，改善设备，致使生产水平一直处在很落后的水

平·加之牙行的盘剥·销路的滞殆·事实证明·处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民族资本工业是没有出路的·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第三节 在三大敌人摧残下

宜兴陶瓷工业的厄运

一· 在日寇铁蹄下的宜兴陶瓷工业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芦沟桥事变·开始向中国进行全面的武装进攻·八月十三日·日寇又向上海发动进攻·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不抵抗政策·日寇的铁蹄很快就踏遍了半个中国·许多城镇和乡村顿时浸沉在日寇烧杀的血泊中·

丁蜀镇的陶瓷业生产在日寇飞机的几次轰炸下·许多窑场被破坏·只好停工歇火·比较大的资本家·带着家眷席卷了资金·纷纷逃往上海·武汉·陶工四散·整个窑场呈现出一片萧条凄凉景象·

一九三七年十月二十六日·日寇铁蹄终于踏进了宜兴丁蜀镇一带·烧杀抢掠·洗劫一空·被破坏的厂房·民房·在汤渡一带有三百多间·在丁山一带有二百多间·在蜀山一带有一百多间·许多无辜的妇孺老人被惨杀·许多窑座被破坏·还有不少窑座被日寇改做炮台·筑作碉堡·据统计·抗战期间·“窑场在日寇恣意摧残下·厂房被毁·窑座毁的毁·坍的坍·损失达五亿元以上”（参见《江苏宜兴丁蜀区陶业概况》1954年油印本第18页）·美丽的陶都都顿时变成了鬼域魔墟·断垣残壁·